

#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

靳涛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发展与转型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经历了计划体制的有效期、低效期和混乱期, 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趋势明显。而从1979至2008年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一路高歌, 但即便在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维系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虽然这种增长是高速的, 但其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和谐也是很突出的。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1)04-0008-09

在60年的历程中, 新中国历经了从不发达的农业经济过渡到发达的工业经济的过程, 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先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又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可以这么说, 这60年既是中国制度变迁的60年, 又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60年, 并且这二者互相交织, 不可分割。发展与转型是中国这60年的主旋律, 但这种主旋律是怎么展开的? 为什么会发生两次方向相反的制度变迁? 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试图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 重新解释新中国60年历史进程的主要缘由和内在逻辑。以往的很多研究, 都是专门对制度变迁或者单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 而没有从两者关系的角度以及从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角度来整体地看待这一问题。

##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回顾

### (一) 经济增长的态势与前后段比较

从1949年到2008年, 中国经济从一个被人欺凌、落后挨打的不发达农业国, 发展成为当今世

收稿日期: 2010-1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轨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2009JJD79003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经验教训研究”(09BJL002)

**作者简介:**靳涛, 男, 山东嘉祥人,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界受人关注的制造业大国;工农业总产值从当时 1949年的 466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100 元,发展到 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00 67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2 698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 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在波折中增长的过程,虽然经济增长是这 30年的主旋律,但在许多年份都有经济明显回落的趋向,并且整体增长态势呈现逐步递减的过程(见图 1)。这从表 1可以进一步洞察。表 1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30年的总体经济增长指标呈递减态势。这一特征和改革开放后 30年的增长态势是明显不同的。从图 2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改革开放后 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路高歌,在 30年经济增长中几乎没有明显的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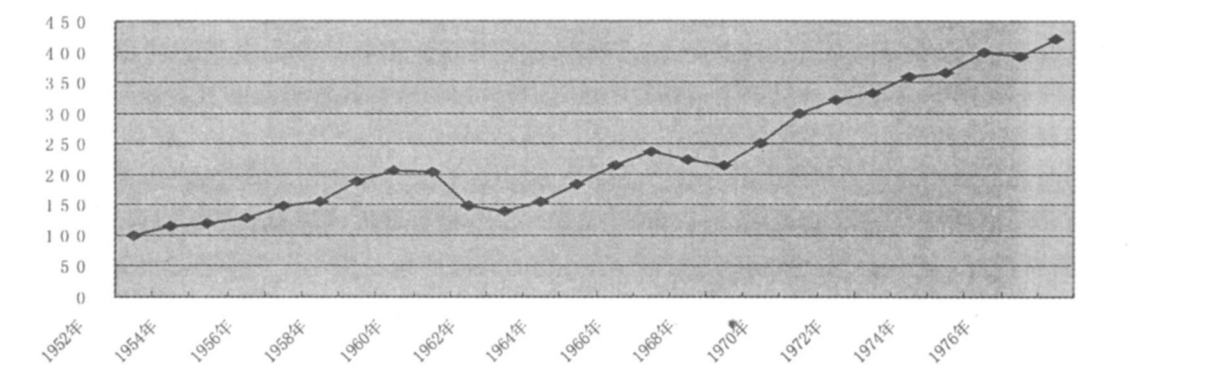


图 1 1952-1978年中国 GDP指数变化图 (以 1952年值为 100)

数据来源:《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版。

表 1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指标					(单位: % )
时间段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积累率
“一五时期”	11.3	10.9	9.1	8.9	24.2
“二五时期”	-0.4	0.6	-2.2	-3.1	30.8
1963-1965	15.5	15.7	14.9	14.7	22.7
“三五时期”	9.3	9.6	6.9	8.3	26.3
“四五时期”	7.3	7.8	5.5	5.5	33.0
1976-1978	8.1	8.0	5.8	5.6	33.5
1953-1978	7.9	8.2	6.0	6.0	29.5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4-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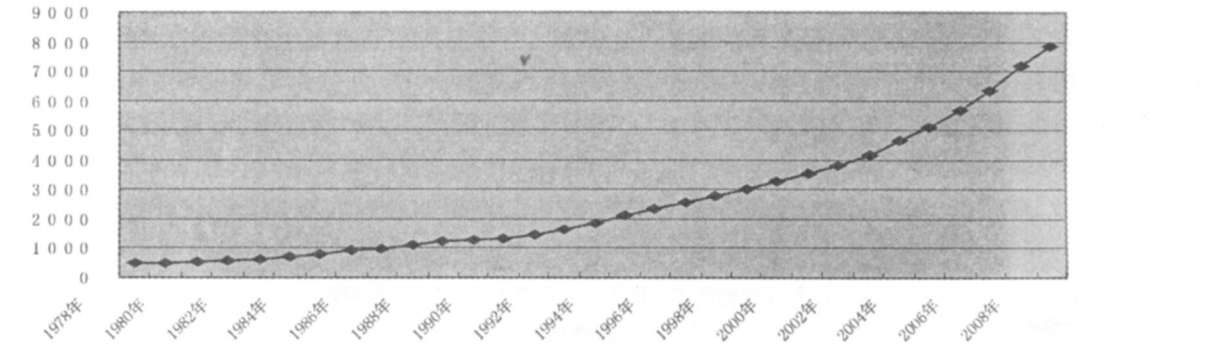


图 2 1979-2008年中国 GDP指数变化图 (以 1952年值为 100)

数据来源:《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年版。

## (二)两种相反方向制度变迁的回顾

### (1)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觉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已走到了尽头。人们渴望一种新的体制,这种新的体制必须能克服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的种种弊端,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好像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建立的,许多人心目中的渴望反映为对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追求。1917年10月爆发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前苏联计划体制的优越性在二次大战中得到突出表现。二次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在前苏联的帮助和本国抗击德国法西斯革命的胜利后,也纷纷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中国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政权,所以中国革命胜利后,选择像前苏联那样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体制,也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

当时的计划经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优于市场经济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几年相对稳定时期外,资本主义经济多陷于混乱、危机与萧条之中,世界政治中则是多种矛盾错综复杂,冲突不断,险象环生。而前苏联计划体制的示范,加上德国法西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sup>①</sup>,经济发展较快,军事经济潜力迅速恢复,都让人们相信计划体制优越于市场体制。而美国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也说明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在上述逻辑下,中国1949年革命胜利后,自然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并在这条路上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 (2)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体制的所有制结构来看,由于公有制主体的自利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每个经济主体都希望社会的资源配置能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希望按自己的目标来影响中央的计划目标,这样必然造成中央计划目标与实际的偏离。从计划体制的运行动力来看,按劳分配作为一种“激励兼容”的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动力因素。但由于计划体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对信息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从计划体制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信息条件是中央计划体制无法满足的,这就决定按劳分配的动力机制在计划体制中起不到作用,实际实行的是按职务和级别分配,这进一步说明了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另外,由于中央计划体制的层次多、结构复杂,使得非现场决策成为经济决策的普遍特征,因而决策效率低是一种普遍现象。毛寿龙(1995)认为:“由于在可分配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因而在实践中按劳分配制变成了简单易行的固定工资制。这就制约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实践表明,行政监督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来改善计划经济的效率,而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低效率就成了计划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由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财政体制在运行过程中高度地依赖于政府强制与政治动员等非经济因素的集中控制,而导致了普遍的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才使财政体制改革(变迁)被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器而凸显出来。”郭灿鹏(2001)则认为,在计划体制国家,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分配效应来实现财政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的结果,一定会使得政府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农业等部门的剩余资金转移到工业部门,并以此作为强制性积累机制,这必然

① 最高中央经济调节机关为帝国经济部,下设各专业管理局。1934年根据“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垄断组织基础上,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它们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家及法西斯政权自下而上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特设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拥有无限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定工作。法西斯政权通过以上种种经济调节机构,对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领域,实行了全面的控制。

造成价格和结构的扭曲。林毅夫等(2002)也认为,计划体制的赶超结构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也必然会造成工业结构的扭曲和弊端。

由于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就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逐渐探索逐渐明确的,虽然改革已经走过了 30 年,且在 1992 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但就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而言,这个过程仍没有结束。

## 二、新中国 60 年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

### (一)改革开放前 30 年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

#### 1 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1949–1957)

从 1949 年到 1952 年,中国经历了三年恢复期,1952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343 亿元,这已经达到战前最高水平。从 1953 年到 1957 年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简称“一五”),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时间内就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在“一五”期间经济实现了全面高速增长,并对全国生产布局做了重新调整和部署,奠定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在这个时期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1.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8%。在这个时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体制在人们热情和急迫的心情中,通过对其他私有经济成分的改造,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快步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计划体制的预期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2 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伴随着结构扭曲的经济增长期(1957–1966)

1957 年到 1966 年是计划体制全面实施并达到高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政府理想地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完全可以加快,毛泽东主席在 1958 年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发展思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全面反映了当时计划决策者的主观心理。计划体制下强调“重工轻农,一大二公”的特点,在这个时期表现非常明显。这种不实事求是、拔苗助长的态势引起经济的振荡和波动,随后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才得以摆脱经济低效、人民生活困难的状态。这个阶段是计划体制特点充分体现的十年,虽然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但总的来看仍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这个时期初步建立了独立的、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9.2%,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3.8%。

#### 3 计划体制政治挂帅下社会动荡的经济增长期(1966–1976)

1966 年至 1976 年是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最为典型和突出的时期。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徘徊增长阶段,虽然在科学技术和三线建设方面仍取得了成就,但这期间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经济低效率问题、百姓生活穷困化问题和社会秩序混乱无序等方面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虽然除 1967 年和 1968 年外,工农业总产值均实现正增长,但增长主要是原有经济的累积性增长,且增长速度也较前二个阶段低。在这个时期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8.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8.7%。这个时期计划体制效率已大大降低,人浮于事,低效率和经济结构扭曲等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都已日渐显著,计划体制的优越性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赖。

###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

#### 1 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1978–1991)

1978 年中国改革之初,中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生产,缩小与国外富裕国家的差距;二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当时,人们对改革的目标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在拨乱反正中意识到应该离开传统体制的“此岸”,却不知所要到达的“彼岸”,而只是从对传统体制的批

判中引申出走向新体制的基本方向。这一时期主要进行拨乱反正和农业改革与价格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8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统一的体制”,同时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调控模式,这都反映了决策者对改革的目标由模糊到清晰的渐变过程。这一阶段以农村土地改革为突破口,放开市场,被长期压抑的社会需求得到突然的释放,短缺经济特点非常明显。而需求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一时期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轻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非常迅速,GDP年度平均增长率达到9.7%。

##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与探索期(1992-1996)

在此阶段最重要的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与此相关的财税、金融、外汇、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成了改革的重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多种所有制经济迅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逐渐显现。在此阶段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已从国民经济的主要调节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市场已成为调节国民经济的主要工具。该阶段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而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地方政府主导下要素市场扭曲而持续强化;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低成本(土地、劳动力)优势,开始成为加工制造业中心,从而带动了中国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1%。

##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与巩固期(1997年至今)

1997年后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逐步成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增长效率差,粗放式增长模式固化、收入差距加大等问题逐步突出。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说明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说明这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依旧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7%。

进入这个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过渡,今后将会进一步改革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多干预和影响,走科学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 三、基于新中国新60年历史实践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揭示

## (一)计划体制下的增长效率递减的逻辑揭示

从新中国1952年到1978年计划体制实施的过程来看,GDP增长率明显存在效应递减现象,因此就必然产生进一步变革的要求。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别的计划体制国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从计划体制的实施结果来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计划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这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下降趋势可以明显印证,如前经互会成员国<sup>①</sup>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见图3)。

计划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计划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教授Martin Seniqi认为,社会

① 前经互会成员国是指以前苏联为主的包括一些东欧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一种经济互惠组织。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前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等国家。

主义计划体制“成功地动员和活跃了当时所有的生产潜力。但是这种体制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波兰经济学家斯·英德里霍夫斯基则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实行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助于集中力量完成全国性的任务。但是这一过程不宜太长。因为经济管理权过于集中,必然会束缚企业的自主性,使经济的发展丧失动力。”既然计划体制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适宜采用的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呢?从社会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来看,由于人类的理性有限,政府计划部门没有能力保证国家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会在某一个特殊阶段的期限内,通过集中配置资源,较好地满足国家特殊利益的需要。所以,当一个国家遇到特殊困难和面对一个大的挑战时,如战争、灾害或者面对一项重大的任务时(如快速发展工业化、加快军事工业发展或攻关某一重大课题时<sup>①</sup>),由于在集中调配国家资源方面的优势,计划体制在此时的优越性会很突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只有在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挑战或处在特殊时期,以及整个国家面临某种紧迫问题时在较短期限内实施时才是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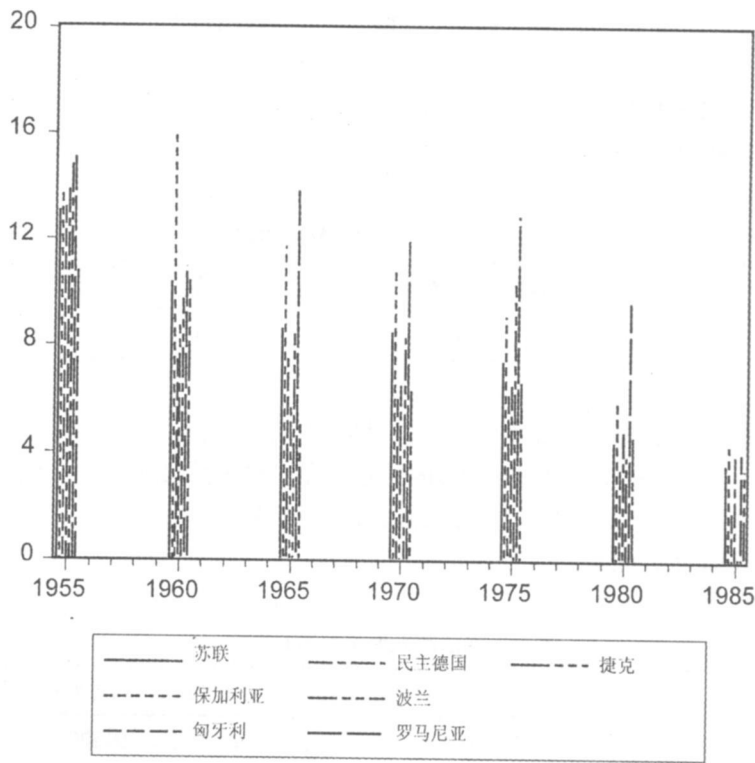


图 3 前经互会成员国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 (年均, %)

数据来源: 根据《经互会统计年鉴》1989 年第 18-48 页数字、《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90 年第 674 页数字整理计算。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46-147 页。

(二)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逻辑揭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具有标志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其次, 经济运行市场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打破以往的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僵化体制, 建立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起支配性

① 如社会主义国家“两弹”和“飞天”计划的实施, 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优越性。

的调节作用。再次,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和国际合作机会,提高了经济的开放度和竞争强度。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四个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 (NL)、市场化程度 (ML)、对外开放程度 (OL) 和政府干预程度 (GL)。我们用经济增长指数来表示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状况,把 GDP以 1978 年设定为 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靳涛, 2007)。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三个步骤完成: 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  $\ln\text{GDP}$  (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 和  $\ln\text{TL}$  (制度变迁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 的平稳性; 第二,确定  $\ln\text{GDP}$  和  $\ln\text{TL}$  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  $\ln\text{GDP}$  和  $\ln\text{TL}$  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 E view s4 0 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  $\ln\text{GDP}$ 对  $\ln\text{TL}$ 做 OLS估计,结果如下:

$$\ln\text{GDP} = - 7. 7536 + 3. 6829\ln\text{TL} \\ (- 16. 7647)(30. 4602)$$

$$R^2 = 0. 973\ 762, DW = 1. 231\ 113, F = 927. 8210$$

对残差  $\mu$  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残差平稳性的 ADF 检验

变量	ADF 值	检验形式 (C, T, L)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mu$	- 3. 0950	(C, 0, 1)	- 3. 7204	- 2. 9850

表 1中检验形式 (C, T, L) 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期数,由表 2知,在 5% 显著性水平下,  $\mu$  是平稳的,因此,上面方程中  $\ln\text{GDP}$  和  $\ln\text{TL}$  的关系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再作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概率
$\ln\text{TL}$ 对 $\ln\text{GDP}$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1	0. 2203	0. 6423
$\ln\text{GDP}$ 对 $\ln\text{TL}$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1	9. 9143	0. 0045
$\ln\text{TL}$ 对 $\ln\text{GDP}$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	2	0. 1859	0. 8318
$\ln\text{GDP}$ 对 $\ln\text{TL}$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	2	5. 4957	0. 0125
$\ln\text{TL}$ 对 $\ln\text{GDP}$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3	0. 1999	0. 8950
$\ln\text{GDP}$ 对 $\ln\text{TL}$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3	5. 2369	0. 0096

注: 统计量 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若 P值小于 0. 05 表示因果关系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 P 值小于 0. 1,表示因果关系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反之,则因果关系不成立。

从检验结果看,  $\ln\text{TL}$  (制度变迁指数) 与  $\ln\text{GDP}$  (经济增长指数)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  $\ln\text{FDI}$  和  $\ln\text{IF}$  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但从

检验结果拒绝了  $\ln GDP$  不是  $\ln TL$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的零假设来看, 制度变迁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这清楚说明, 制度变迁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但变迁对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 且不会在短时间衰减; 而反过来经济增长确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决定因素, 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经济增长是带动制度变迁深化的直接动因。

这种检验关系对现在很多人存有疑问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做了一个实证的揭示。很多人认为,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 结果恰好相反, 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 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思的结论是有疑问的。当然, 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 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 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经济增长才是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持续深化的内在原因, 而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 但制度变迁也确实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还是长期和持续的。

#### 四、新中国 60 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教训与启示

通过推动制度变迁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可行的, 但重要的是必须处理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过 60 年的发展, 党和国家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科学发展的决策, 这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我们认为, 中国经济应该抓住契机,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使中国经济运行更为顺畅和有效率。

第一, 推动向市场经济转型(制度变迁)深化,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现状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无法超越和突破的原因所在。如果不能把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向深入, 不能以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取代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那么, 中国要想以集约式经济增长来取代目前已陷于路径依赖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再到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总过程。中国现在已基本完成了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这一过程虽然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却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只有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换, 才算是真正完成了经济转型。

第二, 改革政府管理模式, 以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来带动政府转型。虽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政府的主导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但随着转型的后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也面临重新定位。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进展来看, 政府转型已成了深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和难点。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回归和重新定位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在政府转型中, 政府应当进一步大幅度地削减行政审批, 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 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政府还要适时推进从行政控制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 真正建立完善和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 在经济增长中进一步从制度上协调公平与效率, 提高公众对经济增长的参与权。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 也是目前制约中国收入分配不可忽视的一对矛盾。经济和谐的本质就是需要使社会经济成果能够惠及全社会, 也就是在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安排中需要有一种利益扩散和分享的机制。从目前来看, 提高公众对经济增长的参与权是使社会经济发展



的成果能够惠及全社会的基础,从制度层面制定让全社会更多成员参与的制度和规则,是改变目前收入分配不协调的基础。

第四,加强市场竞争,完善市场制度,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提高效率的唯一出路就是市场竞争,可以看到目前国内高效率的部门几乎是高竞争压力的部门,而政府垄断和行业限制的部门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效率问题。这说明,我们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必须强化市场竞争,完善市场制度。

#### 参考文献:

- 冯舜华等, 2001 《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郭灿鹏, 2001 《中国财政体制(1949-1979)变迁的效率》, 《改革》第 2 期。
- 国家统计局, 2010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胡家勇, 2003 《转型经济学》,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 胡震、宋海荣、胡君暘, 2002 《过渡经济学》,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01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靳涛, 2007 《“制度”与“增长”之谜的揭示》, 《经济学家》第 5 期。
- 林毅夫、刘培林, 2002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林毅夫发展论坛讨论稿。
- 毛寿龙, 1995 《计划体制低效率问题再思考》, 摘自 2004 年 3 月 5 日《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 (Website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http://www.wiapp.com/wdmaste@wiapp.org>
- 斯·英德里霍夫斯基, 1984 《波兰的危机》,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宋则行、樊亢, 1998 《世界经济史》,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Martin Senig 1954, “Yugoslavs Ask West’s Aid On Easing Debt Problem”, *Daytona Beach Morning Journal*, December 28

[责任编辑: 叶颖玫]

##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60 years

JIN Tao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the main theme of China’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st 60 years. From 1949 to 1978, China’s economic system was shifted from an under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to planned economy, which saw the latter’s declining performance pattern from some positive effects to its eventual inefficiency, chaos, and failure. From 1979 to 2008, China’s economy w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uring which it witnessed soa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sitive changes. But such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ustained by the investment-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model promo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such a model,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been high, but problems such as internal inefficiency and disharmony are salient. 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further deepen our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and make efforts to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from 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 to market-led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